

黄保真 成复旺 蔡钟翔 著

中國文學理論史
(五)

北京出版社

(京) 新登字200号

内 容 提 要

本册为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运动前夕（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理论史。书中围绕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封建正统文学思想斗争的主线，全面释述了这八十年间文学理论急剧而复杂的变化过程；着重分析了传统杂文学理论体系的终结和新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对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等重要文论家作了较为深入而充分的评价。

中国文学理论史（五）

Zhongguo Wenxue Lilun Shi

黄保真 成复旺 蔡钟翔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政 编 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89 000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00-01359-5/I·190

定价：（精）9.50元

本册(第七编)由黄保真同志撰写并定稿。

目 录

第七编 从鸦片战争时期到五四运动前夜

概 述.....	(3)
----------	-------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前夜到甲午战争

时期的进步文学理论.....	(16)
----------------	------

第一节 龚自珍.....	(16)
--------------	------

第二节 魏源 包世臣.....	(25)
-----------------	------

第三节 冯桂芬 王韬.....	(37)
-----------------	------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文艺思想.....	(47)
--------------------	------

第二章 从鸦片战争前夜到甲午战争时期

文学论坛上的主要流派.....	(60)
-----------------	------

第一节 阮元的文言说和李兆洛、蒋湘南 的骈散合一论.....	(60)
-----------------------------------	------

第二节 从姚门诸弟子到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77)
--------------------------	------

第三节 宋诗派的理论代表——何绍基.....	(93)
------------------------	------

第四节 刘熙载和《艺概》.....	(102)
-------------------	-------

第五节 王闿运与汉魏六朝派的文学主张.....	(117)
-------------------------	-------

第六节 谭献、陈廷焯对常州派词论的继承与发展.....	(128)
-----------------------------	-------

第三章 戊戌变法前后的文学理论.....(148)

第一节 “诗界革命”理论与黄遵宪的成就.....	(149)
--------------------------	-------

第二节 “文界革命”理论与梁启超、袁廷梁、 严复的不同倾向.....	(168)
---------------------------------------	-------

第三节	“小说界革命”理论·····	(186)
第四节	张之洞、陈衍的诗文理论·····	(207)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理论·····	(223)
第一节	章炳麟和中国杂文学理论体系的终结·····	(223)
第二节	王国维的资产阶级“纯粹”文艺哲学·····	(254)
第三节	南社的革命文学思想及其成员之间 的理论斗争·····	(320)
第四节	鲁迅初期的文学思想·····	(349)

第七编 从鸦片战争时期 到五四运动前夜

概 述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八十年，在中国社会政治史上，属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前半段，即旧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特点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过程在本历史阶段则主要地表现为旧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酝酿、发生、发展并最后失败。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社会性质在变，经济基础在变，阶级结构在变，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变；文学理论作为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经济变革的文化变革的一部分，当然也在变。不过，文学理论的变革，除了遵循整个文化变革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并表现为特殊的形态。

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发生了什么重大变革，具有那些历史特点，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性呢？

第一，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领域中，产生了一种具有新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内容的文学理论，并发生了与以前的一切文学理论斗争性质不同的理论斗争。这一变化是为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决定、所制约的。在

清代中叶以前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学理论主要地是封建的经济、政治及其变化、发展的反映；文学理论领域中所发生的斗争，也主要是地主阶级在它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之间的斗争。但是，在这一时期中，一种新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地发展了起来，原来完全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占着优势，但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显示出它的优于封建经济的巨大力量。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新的阶级、新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从封建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他们代表着本阶级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宣示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在实践中参与、在理论上指导了文学领域中的变革。他们的文学理论，具有与几千年来的一切文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社会性质，反映了新经济、新政治的历史内容。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对封建正统的文学理论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并且成了推动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变革的有力手段。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在文学理论上的斗争，虽然是新旧两个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但却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然而，本性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仅没能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创造出无愧于本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理论硕果，而且随着政治革命的失败，文学理论阵线也迅速地分化、蜕变，其中有一部分与封建的文学思想合流而走向了反面。

第二，在这个时期，文学理论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哲学、社会学说，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的一切文学理论，其思想、方法都离不开儒、道、释三家。换句话说，儒、道、释三家的哲学、社会学说，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共同为封建阶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思想依据与思维方法。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民族危机的日

益深重，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逐步激化，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始向西方学习救国的真理。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说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物质文明一起输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方法论、社会政治思想来观察中国社会，自然也研究中国社会中的文学问题。于是就把文学理论，部分地或基本地建筑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说之上了。可以说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凡属进步的文学理论都程度不同，角度不同，内容不同地对封建阶级的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其中主要指儒，也兼及道、释）作出批判，或者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说的影响。但是，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进步的文学理论家，几乎都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因而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阶级的深刻烙印，其文学思想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影响。甚至有的人，先进了一阵子之后，自我否定，重新趑回，在文学论坛上，又成了“粹然儒宗”。当然，也有人将西方反动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思想，与中国封建士大夫的腐朽颓靡的审美情趣熔为一炉，而成了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的反动文学的鼓吹者。

第三，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与概念体系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是以杂文学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关于文学的义界、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原、文学的作用、文学的语言、文学的体制、创作的方法、审美的鉴赏等一系列问题，都形成了特有的范畴、概念，并由这些范畴、概念，有规律、有层次地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概念体系。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倾向，不同流派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之间发生的一切争论与斗争，都不是打破这个概念体系，而是在这个概念体系的基础上，用新的经验、新的思想、新的历史内容去修正它、发展它、丰富它。但是，待到中

国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产生以后，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以及在杂文学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概念体系，便逐步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打破了诗文正宗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小说、戏剧的理论认识。人们热情洋溢地、甚至是极度夸张地阐明了小说、戏剧的社会作用、艺术特点。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这类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小道”、视为“乱源”的文艺样式的社会地位，使之与诗文一样并列为文学正宗。其次是开始介绍近代欧洲发生的文艺思潮及其有关的创作方法。特别是“写实派”（现实主义）与“理想派”（浪漫主义），对近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尤为深远。再次是提出了新的关于言、文关系的理论，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白话文运动，有力地冲击了统治中国文坛两千多年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并进而促使以文字型文学语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关于文学形式的理论、审美鉴赏的理论、作家修养的理论、艺术技巧的理论等等，开始发生变化。最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纯粹”文艺理论和“纯粹”文艺哲学输入，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被作为文学艺术的特殊本质，从理论上作出了新的估量。一种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功利”、“非功利”、甚至“反功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体系、美学体系，被鼓吹、被提倡，并且进而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创作经验相结合，而取得了初步的民族化的形式。一种以新的纯文学观念为基础，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纯粹”文学、“纯粹”美学的概念、范畴体系为框架，并且融汇、吸取、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新的理论体系，也初具规模了。虽然在本篇叙述的历史阶段中，并没有全面完成由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向近代中国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而且在近代中国纯文学理论的开创者中，有的人（如王国维）所介绍乃至所建立的纯粹文艺哲学体系本身，已经过时，已经腐朽，已经不能作为指导当时的文学运动的理论、原则，而只能在总结中国古代的艺术经验方面，做出贡献而已。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文

学理论同中国近代的整个“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一样，“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因而，它既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文学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也不可能创建出中国资产阶级自己的指导文学彻底变革的纯文学理论体系。

以上三点，只是从主要方面概述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文学理论领域中的主要变化及其历史特点。至于文学观点的变化，历史特点的形成，那是经历了一个具体的、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主流和主线是什么呢？概括言之，本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酝酿、发生、发展到最后的蜕变、分化；而本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主线则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形形色色的封建正统的文学思想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形式、各个方面的复杂斗争。在将近百年（文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并不能完全以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起止）的演变过程中，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酝酿阶段。从时间上说，这一阶段花费的时间最长，大约从鸦片战争前夜开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结束。这时活跃在文学论坛上并代表进步文学思潮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其中也包括洪仁玕那样的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革命家。文学理论斗争的中心集中在文统、道统、政统三方面。首先对封建文统、道统发动攻击的是包世臣，他不仅否定了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在文统、道统中的合法地位，而且否定了为清代统治者所提倡、所尊奉的程朱理学的无上权威，从而推动了文学思想的解放。龚自珍则是以文学为武器最早对腐朽的清王朝，乃至包括封建文学在内的整个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作出无情批判的杰出思想家。他作为近代中国文坛上以文议政之风的开拓者，其文学主张也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传统的进步内容。另外，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尖锐矛盾，也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表现出来。林昌彝（1803？——1873

后)在林则徐帮助下写成的“意专主于射鹰(英)”的《射鹰楼诗话》，就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诗话》中刊载了大量反映鸦片战争的优秀诗篇，其中包括林则徐、魏源、张维屏、朱琦等人的反帝佳作。他满怀“激昂慷慨”的爱国情感，热烈地赞扬了爱国诗人的爱国诗篇，肯定了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清廷腐败无能的深切幽愤。林则徐在《致林芑谿书》中称赞其“诗笔”“雄厚俊逸”，“《诗话》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见《射鹰楼诗话》卷一)。

昌彝，字惠常，号芑谿，福建闽侯人，同魏源交谊甚深。其著作尚有《衣颿山房诗集》、《小石渠阁文集》、《海天琴思录》等。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昌彝)这些人，从整体上说，虽然没有完全突破封建阶级的思想体系，但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学理论中，毕竟包涵着带有近代特征的积极因素，是可以看作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第一批先驱者的。在他们之后出现的第二批人物，就是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等人，他们都比较熟悉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政治制度、历史状况，因而在政治思想方面，从根本上突破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体系，而要求实行“君民共治”的政治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文学思想，虽然还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的继承与革新，但已经明确提出文学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改革服务的要求了。与此相应，他们对当时代表封建正统的文学思想的批判，也比前人深化了一步。至于洪仁玕，当然从政治思想到文学理论，都比冯、王等人更为激进。他对封建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否定，对“从心”、“纪实”的写作原则的提倡，对“新闻”理论的建设等方面，都代表着这一发展阶段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当然洪仁玕的文学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最突出的就是在文学理论中作“天父”“天兄”的宗教宣传，甚至把“诚求上帝，默牖予衷”说成为创作灵感的泉源。在中国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酝

酿阶段，从理论到实践都在维护封建文统、道统并极力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的主要文学流派是桐城——湘乡派，其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则前有方东树，后有曾国藩。特别是曾国藩，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支撑清王朝的柱石，而且在思想上、学术上，特别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上，也是封建正统势力在这一时期内的最大代表。曾国藩把政治上的顽固、反动与理论上的博大、圆通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权倾朝野，“功”高一世，广罗文人，以为羽翼，因而便成为古文家和宋诗派的当然领袖。不过，这时封建地主阶级文坛上的内部斗争，也是复杂而激烈的。其主要表现，一是封建正统势力的分化，二是不同流派间的斗争。例如桐城——湘乡派中，既有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爱国者姚莹，也有后来转化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薛福成。所谓声名赫赫的“曾门四弟子”，除一个张裕钊墨守曾氏家法，全力维护“道统”外，其他三位，薛不必论，吴（汝纶），黎（庶昌）也无一不变。至于封建文坛上的派别斗争，有的竟闹得情同水火。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骈散之争”。在鸦片战争之前，以阮元为首领的一派提出“文言说”来夺取桐城派在文统中的正宗地位；李兆洛则编《骈体文钞》提倡骈散合一，几几乎要取代桐城派的写作法典《古文辞类纂》。蒋湘南后出，他从“道”与“文”两个方面立论，意在拆毁桐城派古文的一切立脚之地。这类斗争虽然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流派的斗争，但在客观上却是在为近代文体改革扫清道路。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以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文学改革运动的兴起和“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理论的成熟为标志的阶段。其时限主要包括戊戌变法前后的十几年，即从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辟韩》等四篇论文，对封建文化展开批判开始，到1907——1908年鲁迅撰写并发表《摩罗诗力说》等四篇论文，或者到1909年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正式成立结束。在这十几年中，文学理论领域里

的先进者，文学运动的指导者，是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两方面所进行的变革，都是前无古人的。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们掀起的文学运动，以及这个运动所获得的创作成果、理论成果，代表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就和本质特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迅速分化了，有的蜕变为保皇党，有的转化为革命者，也有人则动摇于两者之间。但他们所领导的文学运动却仍在深入，仍在发展，仍在前进，而他们的主要文学理论家梁启超、黄遵宪也取得了新的理论成就。梁启超甚至第一个把近代欧洲的文学思潮及其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在这一时期中，主要有三种势力与进步的文学潮流相对抗。一是以湖南豪绅王先谦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是著名的学者、文人，文宗唐宋，间学魏晋，修洁简练，自成一家，与当时拟古主义的最大代表王闿运并称“二王”。他编有《续古文辞类纂》，欲明义法、源流，以承姚鼐余绪；自著有《虚受堂诗文集》。他曾指名攻击康、梁为“无君无父之乱党”。其门人苏舆编的《翼教丛编》一书，则是当时顽固派攻击变法维新，反对文学改革，维护纲常名教的反动言论的结集。此派要人中还有一个叶德辉，论文私淑归有光、方苞、姚鼐，作有《轺轩今语评》、《非幼学通议》等，辱骂新学“背叛圣教，败灭伦常”，“误尽天下苍生”。此派所定的《湘省学约》中提出“正人心，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可以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文学思想针锋相对的封建顽固派的文学思想的纲领。二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以学通中西，折衷新旧的面目出现，提出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张之洞的《劝学篇》标榜“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因此，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中发挥的历史作用，远远超过了王先谦辈的谩骂攻击。就连“百日维新”

期间所颁的谕旨中，也称赞《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因着各省督抚学正，“广为刊布，实力劝学，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四六）。实际上，张之洞却是在文学理论领域中真正维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的“圣训”，并以巩固封建道统、封建文统为目的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三是自称为“寂与困者”的诗歌流派“同光体”。此派人物更为复杂，如陈三立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曾协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变法失败，先做“神州袖手人”，辛亥革命后，索性又做了遗老。此派代表人物还有陈衍与郑孝胥。在本阶段他们还不是资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要对立面，但到了第三阶级则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论敌了。柳亚子在《怀旧集·介绍一位现代的女诗人》中，甚至说“从晚清末年到现在，四五十年间的旧诗坛，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时代”。

在第二阶段新旧文学、新旧文学思想的对战中，有个值得一提的特殊的复杂人物，就是林纾。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福建闽侯人。他是近代著名的小说翻译家。在他一生中，用文言文翻译的西方小说多达170余种，其中有50种左右译于辛亥革命之前。其时，他每译一书，皆有序跋、例言、识语、剩语一类的批评文字，从总的倾向来看，与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文学改革运动的思想、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林纾又是个思想复杂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不仅前期与后期不同，而且在前期思想中，也同时存在积极、消极两个方面。其政治观点既拥护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要求振兴实业，但也维护封建制度，恪守封建礼教。其文学思想崇奉程朱，文宗桐城，但又翻译小说，呼吁救国。1901年，他因“触黄种之将亡”，流着眼泪翻译了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译名《黑奴吁天录》，并在跋语中自述译书动机说：“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为了救国，他译书时一再

鼓吹学习“西学”，并且明确指出学习的目的是反帝“备盗”。他说：“备胥篋之盗，则以刃、以枪；备灭种之盗，则以学。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而盗力穷矣。”（《雾中人》序）另外，林纾还是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对中西文学作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他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斐洲烟水愁城录〉序》、《〈块肉余生述〉前编序》等文中，将西人文体、笔法、技巧之妙与我国的《史记》、《红楼梦》乃至“古文家言”相比较，确为当时的一代青年开阔了眼界。难怪郭沫若说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堪与梁启超相比，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我的童年》）。这样说虽嫌崇誉过当，但它至少可以说明，林纾在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文学改革运动中的理论贡献、文学劳绩，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即把此时的林纾同辛亥革命后眷恋“故君”，敌视民国的林纾区别开来，同“五四”时期疯狂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林纾区别开来。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理论的发展、蜕变、分化、转化的阶段，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纯粹”文学理论体系、“纯粹”文艺美学体系的建设阶段。经过民主共和论与开明专制论的大论战，梁启超等人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一落千丈，这便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和创作队伍、理论队伍的重新集结。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正式成立，并迅猛地发展壮大起来。该团体虽是乘革命高潮而起，但成员中未免鱼龙混杂。它的创作倾向、理论主张也不尽一致，就其主流和代表人物来看，他们在理论上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文学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问题，从而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想推上了最高阶段。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理论体系，便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分化、蜕变了。有的人随着时代前进了；有的人则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同代表封建守旧势力的文学流派——“同光体”合作；也有的人堕入了当时的文学逆流，成

了“鸳鸯蝴蝶”、武侠黑幕小说的鼓吹者、创作者。这一时期，著名的资产革命家、宣传家章炳麟，对文学理论的贡献却是颇为特殊的。他既热情地赞扬过民族、民主革命文学的雷霆之声，但又继续坚持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纯粹文学理论和纯粹文艺哲学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在政治上懵懂，学术上求新的王国维；一个是以“精神界之战士”崭露头角的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青年鲁迅。他们二人的共同点都是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纯粹文学理论、纯粹文艺哲学入手，都尊奉“唯意志论”（“新神思宗”）的哲学流派；但不同的是王国维倾心于叔本华，并以他的悲观主义哲学为基点观察文艺、研究美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经验，特别是对戏曲发展的过程、规律，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并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纯粹文艺哲学得以初步地民族化。鲁迅则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吸取、改造了尼采哲学，并以欧洲的“摩罗诗人”为典范，鼓吹反抗，激烈斗争，预言“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也就是召唤新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到来。从而把中国的文学理论导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在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的这段资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低潮时期，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却开始了他的美学、美育活动。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同盟会会员，早年与章炳麟、陶成章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赴德留学，研究哲学、教育学、美学。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研究美学、提倡美育是为了革命、救国、改造国民精神。但他的美学观点却主要是发挥康德的“纯粹美感”之说，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和历史实际对它作了某些补充修正。他说“世界有二方面”，“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为“观念”，超轶于现世的利益之上。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执著于现象世界，一味地急功